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九期

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編



蘭臺出版社

中國中古史研究

Medieval China Study No.9

第九期



蘭臺出版社

《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九期=Medieval China Study.

NO.9/ 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輯

初版. -- 臺北市：蘭臺，民 98.12

面；公分；

年刊

ISBN 978-986-7626-94-3 (平裝)

1. 中國史 2. 中古史

622

98023553

《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九期

Medieval China Study No.9

總編輯：雷家驥

編輯：中國中古史研究編輯委員會

執行主編：朱振宏

封面設計：黃翠涵

出版者：蘭臺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 20 號 4 樓

電話：(02)2331-1675 傳真：(02)2382-6225

劃撥帳號：18995335

e - m a i l : lt5w.lu@msa.hinet.net

網路書店：<http://w.w.w.5w.com.tw>

<http://www.books.com.tw>

香港總代理：香港聯合零售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大蒲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樓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話：(852) 2150-2100 傳真：(852) 2356-0735

出版日期：2009 年 12 月初版

定價：800 元 (平裝)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ISBN：978-986-7626-94-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九期

2009 年 12 月

目 錄

從突騎到甲騎具裝 - 魏晉南北朝騎兵之演進·····	常彧·····	1
魏晉南北朝中央財政機構的整合·····	劉嘯·····	41
略論魏周隋之間的復古與依舊 - 一個胡、漢統治文化擺盪改移的檢討·····	雷家驥·····	97
中古「天文」政治意義略說·····	趙貞·····	135
從文化產業的發展看五代文明的演進與變化 - 以相關手工業的發展為中心·····	杜文玉·····	173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所見之宋代勤王西軍統帥部·····	張春蘭·····	195

Medieval China Study

No.9

2009.12

Contents

From Shock Cavalry to Armoured Cavalry:The Development of Cavalry in Medieval China.....	Chang, Yu..... 1
Discussion on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Revenue and Chamberlain for the Palace Revenues in Wei,Jin,Southern and Nothenrn Dynasties.....	Liu, Xiao.....41
The Restoration and Adherence of Polity in Wei Chou Sui Dynasties— A discuss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Hu and Han Ruling Cultures.....	Lui Kar-kai..... 97
Explanation On Astronomic Political Symbolism in Mediaeval China.....	Zhao, Zhen.....135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Evolution and Changes in the Ey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Handicraft.....	Du, Wen-yu.....173
The headquarters of reinforcement in Song Dynasty Reflected by Literature on City of Heishui(黑水城) Hidden in Russia.....	Zhang,Chun-lan195

從突騎到甲騎具裝

— 魏晉南北朝騎兵之演進 — *

常彧**

摘要

馬鎧、馬鞍、馬鎧等騎兵裝備的出現、發展與成熟，帶來了古代世界軍事史的重大變革。在中國，騎兵的這一變革出現在東漢至南北朝時代，變革的標誌在於騎兵從突騎到甲騎具裝的演進。本文結合考古資料和世界騎兵史的研究成果，分析史料所載「界橋之戰」、「廉臺之戰」及宇文泰與高歡「潼關之戰」等戰例，說明魏晉南北朝時代騎兵演進的過程。

關鍵詞：騎兵、鎧甲、馬鎧、軍事史、魏晉南北朝

* 感謝朱振宏教授及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引言

唐代軍事學家李靖曾經說過：「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跡焉」。¹西方軍事學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克勞塞維茨曾經這樣來描述戰史：「戰史像其他歷史一樣，許多在最初還清楚的細小特徵和情節自然會逐漸湮沒，它也象圖畫一樣，原來的色彩和生動的形象會逐漸消失，變得色彩暗淡，模糊不清，最後只有偶然遺存的一塊塊顏色和一些線條，這些顏色和線條卻因此受到了過分的重視。」²由於史料記載的「色彩暗淡」，我們對魏晉南北朝騎兵發展史的認識晦暗不明，長期以來忽視了這一兵種在戰爭史、軍事技術發展史和軍事制度史上的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戰爭史入手，仔細分析騎兵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歷史意義。

一、界橋之戰的戰鬥過程與問題

東漢末年，素有矛盾的袁紹和公孫瓚在冀州連年激戰。其中，有關漢獻帝初平三年(192)袁紹與公孫瓚之間「界橋之戰」³的記載尤其詳細：

(袁)紹自往征(公孫)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鬥，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陳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

¹ 唐·李靖，《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此據《武經七書》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下，頁613。

²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Vom Kriege)，第二篇〈論戰爭理論〉，第六章「關於史例」（中譯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168。

³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6，〈袁紹傳〉注引《英雄記》，頁193-194。

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裏，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强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鬥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强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雲「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

《資治通鑑》胡注云：「《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東。此蓋於河瀆上作橋。注又云：清河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⁴該地為華北平原，四周無任何險要，適合大規模合戰。唯一具有軍事價值的，當是枯漳水上的界橋，故將此役命名為「界橋之戰」。

這份來自《英雄記》，經王粲之手撰成的戰鬥報告，詳盡的描述了戰爭雙方的部隊組成、裝備、兵力配置以及戰鬥過程。王粲撰寫《英雄記》，本是為了記錄曹操統一北方前群雄割據時代諸「英雄」的事蹟，因此他努力以公允的立場來敘述「界橋之戰」的戰鬥情況。⁵一般而言，來自對壘雙方的戰鬥報告作為第一手史料，受雙方立場影響，難免出現巨大的差別；而第三者編訂的戰鬥報告雖難免偏見，卻是在綜合雙方材

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60，〈漢紀五十二〉，漢靈帝初平三年正月條，頁1931。

⁵ 劉志偉，〈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英雄傳記」——試論王粲《英雄記》〉，《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74。

料的基礎上，能更加全面的為我們提供雙方部隊組成、裝備、兵力配置情況。結合王粲的記載，我們分析界橋之戰作戰雙方的部隊構成、配置情況如下：

公孫瓚步兵三萬人，居中結陣；以騎兵配置於步兵兩翼，左右各五千。而騎兵內部有明確的分工：「白馬義從」作為騎兵中堅，是騎射性質的騎兵。最外兩翼的騎兵史料中沒有交代其性質，但從「放騎欲陵蹈之」一語來看，應當不是需要與敵陣保持一定距離實施打擊的騎射性質的騎兵。據〈公孫瓚傳〉載：「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⁶可知近距離衝擊、「陵蹈」敵陣的作戰方法，即所謂「突騎」，確實存在於公孫瓚的部隊中。從上引材料中我們看不到袁紹部隊有騎兵的記載，而步兵構成包括：習羌鬥、持長矛的麴義部八百人，⁷居前；強弩一千人，居中；步兵數萬，結陣於後，其中包括大戟士、帳下強弩等兵種。

界橋之戰的戰鬥過程大概是這樣的：雙方列陣完畢後，公孫瓚遣出衝突型騎兵攻擊袁紹麴義部。袁紹矛兵與弩兵配合，粉碎了公孫瓚的第一波進攻，並發動逆擊。在界橋這樣的隘口處雙方進行了第二次激戰，公孫瓚殿後的部隊再次被擊敗，軍營亦遭袁紹部隊襲擊。在追擊的過程中，袁紹本人與主力部隊脫節，遭到公孫瓚騎兵的包圍，雙方展開第三波戰鬥。袁紹的弩兵與回救的麴義部矛兵配合，再次擊退了公孫瓚的騎兵部隊（圖 1-5）。在王粲的敘述中，似乎是公孫瓚一次輕敵且昏庸的指揮造成了自己強大的騎兵部隊的覆敗。而袁紹獲勝則是麴義本人及其部眾勇敢果決的緣故。可是，袁紹八百名長矛兵加上一千名弩兵究竟是怎樣

⁶ 《三國志》，卷 8，〈公孫瓚傳〉，頁 239。

⁷ 所謂羌鬪，應該是指長矛兵。如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鄭太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第 2258 頁），又《後漢書·西羌傳》：「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頁 2886）。《三國志》，卷 1，〈武帝紀〉注引《魏書》稱：「關西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頁 35）。又《三國志·鄭渾傳》：「關西諸郡……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頁 509）。可見，關西地區羌民的「長矛」是他們的戰術特色，因此麴義的八百名步兵應該是長矛兵。

在一次對決中就擊潰幾倍於自己的公孫瓚的騎兵呢？公孫瓚騎兵部隊的失敗，又意味著什麼呢？

二、公孫瓚的騎兵：戰術的成熟與不足

前面已經分析過，公孫瓚的騎兵部隊中有兩種性質的騎兵：突騎與白馬義從。其中突騎大概產生於西漢中期，並且東漢以後廣泛存在於中國古代的騎兵部隊中。騎射與突騎是這一時期中國騎兵部隊的固定組合。在古代世界，騎射與突騎共同組成混編騎兵部隊的例子並不鮮見。「古羅馬人和他們的敵人都發現，使用重型長矛和劍的騎兵並不能完全取代波斯、中國和中亞人長時間來有效使用著的輕重弓箭騎兵。這兩種騎兵在作戰時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弓箭騎兵先把敵人圍住，為長矛兵的衝鋒做好準備。長矛兵的進攻又迫使敵人不得不保持密集隊形，這樣就更容易受弓箭騎兵的襲擊。」⁸

公孫瓚的騎兵部隊之所以引人關注，主要是由於以下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東漢以後，幽、燕地區的騎兵部隊是當時最為重要和強悍的騎兵部隊。光武帝曾經如此評價來自上谷、漁陽地區的騎兵：「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⁹東漢末靈帝光和中，「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公孫)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¹⁰可知公孫瓚實際上演成了這支騎兵部隊的統帥。其二，東漢以來，上谷、漁陽地區的騎兵部隊中有大量的烏桓人。¹¹由他們組成的騎兵部隊，甚至被稱為「烏桓

⁸ Trevor. N. Dupuy & R. Ernest Dupuy, *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4th edition), Chapter 6, "Tactics of Caval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此據中譯本，傅海等譯，《哈珀——柯林斯世界軍事歷史全書》（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1998年），頁118。

⁹ 《後漢書》，卷1，〈光武帝紀上〉，頁14。

¹⁰ 《三國志》，卷8，〈公孫瓚傳〉，頁239。

¹¹ 相關研究參見劉勇，〈東漢幽州突騎述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5期，頁70-75。臧嶸，〈上谷漁陽騎兵在劉秀征戰中的作用〉，《河北學刊》1984年第3期，頁63-66。以及王子今，〈兩漢軍隊中的「胡騎」〉，《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23-33。

突騎」。由烏桓人組成的突騎部隊極為強悍，三國時代人們這樣評價他們：「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¹²東漢中平中，張溫征討邊章，「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¹³而都督這支烏桓「突騎」的，正是公孫瓚。而公孫瓚與袁紹對峙的過程中，最倚重的部隊「突騎」，應當就是由這些烏桓人組成的。

對「白馬義從」這樣的騎射部隊的戰術我們已經有較為深刻的瞭解。¹⁴公孫瓚首先遣出企圖陵蹈敵軍的騎兵部隊最主要的作戰原則就是：利用矛、稍等長兵器，以強大的機動力從兩翼向敵陣發動抵近衝擊。¹⁵類似的作戰方法存在於亞歷山大的騎兵部隊和羅馬共和國時期的預備騎兵(Auxiliary Cavalryman)¹⁶中。更相似的作戰方法，則是薩珊帝國的 Savaran 騎兵。¹⁷在東漢末期和整個三國時期，這種作戰方式廣泛存在於戰爭中。如「時(曹)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¹⁸又「(孫)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程)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¹⁹十六國時代能陷入敵陣衝殺敵軍的「英雄」，甚至成爲人們歌詠的對象。例如著名的〈隴上爲陳安歌〉：「隴上壯士有陳安，驅鞬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驍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

¹² 《三國志》，卷 30，〈烏丸鮮卑東夷列傳〉，頁 835。

¹³ 《後漢書》，卷 73，〈劉虞傳〉，頁 2353。

¹⁴ Antony Karasulas, *Mounted Archers of Steppe 600BC-AD1300*, Oxford: Osprey, 2004.

¹⁵ T. N. 杜普伊(T. N. Dupuy):《武器和戰爭的演變》(*The Evaluation of Weapons and Warfare*)(中譯本，嚴瑞池、李志興等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5 年)，頁 47-54。

¹⁶ Nic Fields & Adam Hook, *Roman Auxiliary Cavalryman AD 14-193*, Oxford: Osprey, 2006, pp. 47-52.

¹⁷ Kaveh Farrokh & Angus McBride, *Sassanian Elite Cavalry AD224-642*, Oxford: Osprey 2005, pp. 27-44.

¹⁸ 《三國志》，卷 1，〈武帝紀〉注引《曹瞞傳》，頁 37。

¹⁹ 《三國志》，卷 55，〈程普傳〉，頁 1283。

還奈子何！」²⁰此外，東漢以來的大量畫像石也可以說明這種近距離衝突敵陣作戰方式的存在。²¹

可是，公孫瓚手下「天下精兵」的「名騎」，怎麼會在衝擊敵人時被對方打得「所中必倒」、「步騎奔走」呢？我們似乎不應該輕易相信這是公孫瓚因輕敵而做出的昏庸決定。《戰爭論》中說過：「指揮官的職位越高，膽量就越小，因為，即使見解和理智沒有隨職位的上升而提高，客觀事物、各種情況和各種考慮也仍然會從外部對他們施加頻繁而強大的壓力，他們越是缺乏個人的見解，就越感到壓力的沉重。」²²更何況久經沙場、戰鬥經驗豐富的公孫瓚。我們更不應該相信趙義區區八百之眾，僅憑勇氣就擊潰了數量幾倍於己、且異常強悍的騎兵部隊。

仔細回顧整個界橋之戰，筆者認為整個戰鬥過程是對壘雙方精心安排和設計的。首先，戰鬥開始前，雙方都盡可能安排了合理的陣型。公孫瓚指揮的是步騎合編的部隊，將步兵集團設置於中央，騎兵分作兩翼的佈陣安排是步騎合編部隊的基本常識。²³這樣安排的目的在於：「趁步兵成行軍隊正在變換隊形時加以攻擊；攻擊騎兵時主要攻擊其側翼；利用敵人橫隊的每個缺口迅速插入，隨後向左右擴展，從側翼和後方迂迴突破口附近的敵軍。」²⁴而對於袁紹方來說，利用長矛作為第一屏障，頂住對方的第一次衝擊，並且與身後的弩兵相互掩護，也是合理的戰術安

²⁰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103，〈劉曜載記〉，頁2694。

²¹ 見濟寧地區文物組、嘉祥縣文管所，〈山東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漢畫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及朱錫祿，〈嘉祥五老洼發現一批漢畫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

²²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三篇，〈戰略概論〉，第六章「膽量」，頁199。

²³ 參見《第六期騎兵戰術講義》，第六章，〈戰鬥〉（中央陸軍大學油印本，印刷年代不詳），頁80-85。此書雖是現代騎兵的戰術講義，卻同樣說明騎兵應該佈置在戰陣兩翼的原因：利用兩翼較寬的戰場，使騎兵便於展開，並獲得較大的機動空間。

²⁴ 弗·恩格斯(Frederich Engels)，〈騎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中譯本：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頁301。

排。希臘重步兵的方陣中的前三列就是由長矛構成，「無論是輕裝部隊還是敵人的騎兵都無法戰勝這密林般的方陣」，²⁵而希臘軍事藝術的繼承者馬其頓的步兵方陣中，「重步兵的長矛換成了更長的馬其頓長矛」。²⁶可見，由長矛兵構築抗擊敵人衝擊的第一線是正常的選擇。在長矛兵的後面配備弩兵，其意義自然在於掩護脆弱的長矛兵。因此，戰鬥開始前雙方都精心、合理的安排了決戰陣型。

其次，公孫瓚騎兵部隊第一次衝鋒之後是否真的陷入潰逃的局面了呢？從後來的戰況看來，並非如此。第一次衝鋒後，公孫瓚的部隊「步騎奔走」，說明在騎兵發起衝擊時，步兵同時壓上。在決定性的會戰中，騎兵衝鋒與步兵壓上往往是同時進行的。在公元前 338 年的海羅尼亞戰鬥中，亞歷山大率領馬其頓的輕、重騎兵居左翼，菲利普率領步兵居右，方陣和雇傭軍居中，在對雅典聯盟的軍隊發起第一波衝擊時，即由亞歷山大的騎兵與菲利普的步兵同時壓上。²⁷即使我們相信王粲所說，即公孫瓚部隊在第一次衝擊時被「臨陣斬甲首千餘級」，實際上對於數量龐大的整個騎兵部隊而言，仍有強大的戰鬥能力(更何況古代的戰鬥報告中「斬首級」的數量存在被極大誇張了的情況)。

所謂「步騎奔走」的情況，應該是：公孫瓚的騎兵發起衝擊後，發現對方長矛兵和弩兵組成的防線難以突破，隨即向兩個方向散開，步兵同時後撤，吸引袁紹步兵壓上，準備在袁紹長矛兵、弩兵與後方步兵主力的戰鬥位置發生變化時，重新發起攻擊。這是步騎混編部隊最常用的戰術手段。前引馬其頓的步騎混編部隊就選擇了這樣的戰術，薩珊帝國的 Savaran 騎兵發起衝鋒時，同樣也採取「騎兵衝鋒後散開，步兵向敵人陣線中間發起衝擊，騎兵再由兩翼夾擊敵人」的戰術。²⁸因此，所謂

²⁵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劍橋插圖戰爭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第一章，〈步兵的起源〉(中譯本，傅景川等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15。

²⁶ 弗·恩格斯，〈步兵〉，頁357。

²⁷ 杰弗里·帕克，《劍橋插圖戰爭史》，第二章〈從古希臘方陣到古羅馬軍團〉，頁38。

²⁸ Kaveh Farrokh & Angus McBride, *Sassanian Elite Cavalry AD224-642*, p.41.

的「步騎奔走」，應當是公孫瓚軍的一次戰術撤退。

第三，公孫瓚部隊真正的失敗是在第二回合的交手中。從後面袁紹自己脫離整個部隊可以看出，在界橋附近的戰鬥中，袁紹的主力部隊已經全部壓上，而公孫瓚「殿後」的部隊卻沒有能夠抵擋住袁紹軍隊的進攻。公孫瓚的騎兵轉身回擊時，意外的選擇了袁紹居於最後的小股部隊，而沒有攻擊袁紹軍隊的主力，使得袁紹有數量優勢的步兵能夠直接衝進公孫瓚的營地。整個戰局以公孫瓚的失敗告終。

從界橋之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重要啓示：其一，經過兩漢長期的摸索，步、騎合編部隊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戰術模式，騎兵內部騎射、突騎的分工明確，配合成熟。其二，在長期與匈奴騎兵的戰爭、與幽燕地區突騎的戰爭中，中原步兵的指揮官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抗擊辦法。利用長、短、遠、近兵器的相互配合，構築清晰的陣線層次。其三，騎兵在衝擊敵方成熟的步兵防線時，並沒有更好的辦法突破，說明騎兵戰術急需改革。衝擊力更爲強大的新式騎兵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

三、馬鐙與馬鎧：新式衝突型騎兵的出現

公孫瓚首先遣出的騎兵不僅不能將袁紹區區八百之眾衝亂，反而被對方長矛所阻，需要散開後由跟進的步兵來完成打擊，這個事實說明當時突騎的衝擊力極爲有限。我們知道，在沒有馬鐙的時代，騎兵正面衝鋒時，只能利用長矛刺殺敵軍，而不能衝撞「碾壓」敵軍。²⁹甚至在衝擊時，只能將長矛舉過頭頂，從上往下刺殺。³⁰如果平端著長矛正面衝擊敵軍，則會因爲承受對方的反作用力而摔落馬下。³¹林恩·懷特(Lynn

²⁹ 弗·恩格斯，〈騎兵〉，頁 298-362。

³⁰ T. N. 杜普伊，《武器和戰爭的演變》，頁 49。

³¹ 此處所說的戰鬥動作，是突騎對敵軍發起正面衝鋒時的戰鬥動作。如果在追擊敵人時，則不必如此，不過，「追擊」本身也不是「衝擊」。我們在東漢的畫像石「胡漢交戰圖」中所看到的衝突型騎兵全都是平端著矛稍向前刺殺，這是因爲畫面中他們無一例外都是在追擊「胡兵」。在沒有馬鐙的情況下衝擊敵人所帶來的危險性，可參見 A. D. H. Bivar, "The Stirrup and Its Origins", *Oriental Art*, n. s., v. 1 (1955), p.

White)先生也指出：「在有馬鐙以前，騎者的座位是不牢靠的。馬嚼子和刺馬距可以幫助他控制他的騎乘；沒有馬鐙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戰方法還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個運動迅速的射手和投槍手，劍戰是受到限制的，……至於說到用長矛，在馬鐙發明以前，它是在臂膀末端揮動的，打擊力量來自肩膀和肩肌。馬鐙使力量大得無比的一種打擊方式成為可能，雖然馬鐙並不要求這個。現在騎者可以穩穩地橫矛於雙臂與軀體之間來攻擊打他的敵人，打擊不僅來自他的肌肉，而且來自他本身和他疾馳前進的騎乘的聯合重量。馬鐙，除了由鞍轡和馳驅所提供的前後兩方的支撐之外，又加上了側面的支撐，於是有效地把馬和騎者融合成為足以發揮前所未見的強力的一個單獨的戰鬥單位。戰士的手不再直接用於打擊了，它只用來指導打擊的方向。馬鐙就這樣用馬力代替了人力，無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損害他的敵人的能力。」³²

馬鐙這種重要的馬具由此納入了我們研究中國古代騎兵的視野。不少學者認為，將騎兵的衝擊能力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是馬鐙出現以後的事情。中西方學者曾大力探討過馬鐙對軍事史的影響。羅伯特·K·G·坦普爾就風趣地說過：「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上，中世紀的騎士就不可能身披閃閃鎧甲，救出那些處於絕境中的少女，歐洲就不會有騎士時代。」³³著名科技史學者林恩·懷特把馬在戰爭史中的作用分為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分別是戰車(Chariot)和騎士(Mounted Rider)。馬鐙的出現則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馬鐙為騎士提供了更為安全的騎乘方式，讓騎士成為更好的弓箭手和劍兵(Swordsman)。更為重要的是，馬鐙讓騎士持矛衝鋒的時候更有效率。從此，在撞擊敵

61.

³² Lynn White, <馬鐙和封建主義—技術造就歷史嗎?>(中譯本, 顧准譯, 譯文及評注見《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香港: 三聯書店, 1989年), 頁32。

³³ 羅伯特·K.G.坦普爾(Robert K. G. Temple), 《中國: 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China: 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南昌: 21世紀出版社, 1995年), 頁12。

人的時候，騎士不再會被彈起來，「無需什麼準備步驟，它立即使馬上白刃戰成為可能，而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新戰鬥方式。」³⁴ 楊泓先生也提到：「馬鐙的發明和普遍使用，使騎兵和戰馬很好地結合在一起，身著沉重的鎧甲的騎兵得以隨心地控御同樣身披沉重鎧甲的戰馬，把人和馬的力量合在一起全力攻擊敵人，完成各種戰術動作，充分發揮兵器的效能。從而開創了以重裝騎兵—甲騎具裝為軍隊核心力量的新階段。」³⁵

那麼，馬鐙的起源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A. von le Coq 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假設：「馬鐙或許起源於騎馬民族，他們想要騎乘時不那麼疲勞；或者起源於非騎馬民族，他們有必要快速掌握騎馬戰鬥的技能」。³⁶ 迄今為止大量研究都認為馬鐙起源於中國。³⁷ 丁愛博先生在他的研究中也認

³⁴ Lynn White,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p. 1-2.

³⁵ 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二論〉，《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156-157。原載《華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三輯。

³⁶ A. von le Coq, *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中亞文化與藝術史圖鑒), (Berlin: D. Reimer, 1925), p. 22.

³⁷ 這是一個人們長期爭論的問題。杜普伊先生在《武器和戰爭的演變》以及《世界軍事歷史全書》中一直認定馬鐙起源於公元前1世紀的印度。這個認識當然是錯誤的，因為他並沒有區分清楚「馬腳扣」、「趾鐙」、「馬鐙」之間的區別。蘇聯考古學家吉謝列夫提出過「西伯利亞起源說」，見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中譯本，莫潤先譯，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頁98。而基茲拉索夫則支持「山地民族起源說」，見И. Л. Кызласов,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тремя» (關於馬鐙的起源),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III (1973), с. 24. 支持此說的還有涅斯傑洛夫，見С. П. Нестеров, «Стремена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南西伯利亞的馬鐙), *Вопросы метода Сибир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Сибирское, 1998), с. 180-181. 歐美學者則多有支持「中國起源說」者。Bivar 較早即認為馬鐙起源於中國，而後來歐洲的金屬馬鐙是在阿瓦爾人的影響下出現的。阿瓦爾人製作金屬馬鐙的工藝則來自中國，或者在中國的邊境得到完善。見A. D. H. Bivar, "The Stirrup and Its Origins", *Oriental Art*, n. s. v. 1 (1955), pp. 61-65. 科技史專家懷特亦認同此說，見Lynn White,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the Stirrup",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pp. 14-28. 此說後來甚至影響到李約瑟和羅伯特·K·G·坦普爾，見羅伯特·K. G. 坦普爾，《中國：發明與發現的國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精華》，頁12、178。日本學者一般也認為馬鐙起源於中國，如：坂本美夫，〈4-5世紀の馬具〉，《考古學ジャーナ

爲馬鐙起源於中國，並受 3-4 世紀東北地區的影響尤深。³⁸與此相似，王鐵英先生在其〈馬鐙的起源〉一文中亦認爲「馬鐙最早出現於中國東北，形制爲木芯長直柄馬鐙……大量事實表明，木芯長直柄金屬馬鐙是東西方各類馬鐙的共同源頭。最早的馬鐙發現於 3-4 世紀中東北鮮卑人活動區域，而馬鐙的西傳也和源出鮮卑族的柔然人密切相關」。³⁹這是迄今爲止關於馬鐙起源問題最爲全面的研究。

學者賦予馬鐙如此重要的軍事史意義，可是我們卻面臨一個極大的困惑：在馬鐙出現以前，中西方的騎兵部隊中裝甲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後代所謂的「重裝騎兵」、「甲騎具裝」等人馬皆著甲的衝突型騎兵在馬鐙出現前就已經產生。⁴⁰在波斯 Khusrau II (A. D. 591-628) 時期 Tāq-I Bustan 的雕刻中，我們可以看到沒有馬鐙而全副武裝的「重騎兵」。⁴¹在公元 8 世紀馬鐙引入羅馬帝國之前的幾個世紀，「羅馬帝國後期的士

メル》第 257 號(1985.12)。還有相馬隆，〈輪鐙源流考〉，《流沙海西古文化論考》(東京：山川出版社，1977 年)，頁 139-158。樋口隆康通過對長沙騎俑馬鐙進行研究，亦認爲馬鐙起源於中國。樋口隆康，〈鐙の發生〉，《青陵》第 19 號(1972.1)。當然，中國學者研究此問題時，一般也支持馬鐙起源於中國。楊泓先生較早關注馬鐙問題，並認爲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陶騎俑所見的「鐙」是最早的馬鐙，見〈關於鐵甲、馬鐙和馬鐙問題〉，《考古》1961 年第 12 期，頁 655。於此相似的認識還有齊東方先生，見〈中國早期馬鐙的有關問題〉，《文物》1993 年第 4 期，頁 71-78。

³⁸ Albert E. Dien, "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rs Orientalis*, Vol. 16, p. 35.

³⁹ 王鐵英，〈馬鐙的起源〉，《歐亞學刊》(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第三輯，頁 93。

⁴⁰ 有關馬鐙的研究，較早有柳涵，〈北朝的鎧馬騎俑〉，《考古》1959 年第 2 期，頁 97-100。楊泓，〈關於鐵甲、馬鐙和馬鐙問題〉。丁愛博先生也曾論及馬鐙問題，見 Albert E. Dien,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mor", *Artibus Asiae*, Vol. 43, No. 1/2. (1981), pp. 5-66. 最爲重要的論文來自楊泓，〈騎兵與甲騎具裝〉，《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33-146。〈騎兵與甲騎具裝二論〉，《中國古兵器與美術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149-161。劉斌，〈十六國北朝時期的甲騎具裝及甲騎具裝備研究〉(太原：山西大學考古系，未刊本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

⁴¹ 圖片見 Roman Ghirshman & James Emmons & Stuart Gilbert, *Persian Art: Parthian*